

周振鶴◎主編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

總論

先秦卷

周振鶴 著

李曉杰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周振鹤◎主编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

总论

周振鹤 著

先秦卷

李晓杰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著. —2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9-12696-9

I. 中… II. ①周…②李… III. ①政区沿革-历史-中国②政区沿革-历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K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3037 号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先秦卷(第二版)
周振鹤 主编 周振鹤 李晓杰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4 字数 728 千
2017 年 9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696-9/K·596
定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图 1-1-1 中国行政区划图



三行注地埋志有商以作其地，尚有二行注
四行地有地，是方地
两行一行注已地，前图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周振鹤 主编

- | | |
|---------|-------------------|
| 总论 先秦卷 | 周振鹤 李晓杰 著 |
| 秦汉卷 | 周振鹤 李晓杰 张 莉 著 |
| 三国两晋南朝卷 | 胡阿祥 孔祥军 徐 成 著 |
| 十六国北朝卷 | 牟发松 毋有江 魏俊杰 著 |
| 隋代卷 | 施和金 著 |
| 唐代卷 | 郭声波 著 |
| 五代十国卷 | 李晓杰 著 |
| 宋西夏卷 | 李昌宪 著 |
| 辽金卷 | 余 蔚 著 |
| 元代卷 | 李治安 薛 磊 著 |
| 明代卷 | 郭 红 靳润成 著 |
| 清代卷 | 傅林祥 林 涓 任玉雪 王卫东 著 |
| 中华民国卷 | 傅林祥 郑宝恒 著 |

全书简介

本书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这一研究不仅是传统的关于历时政区沿革的考证（纵向），而且对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横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的复原以详细至逐年为尺度。全书在总论外，分为十三卷，依次是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代卷、五代十国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及中华民国卷。

在掌握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力求最大可能地反映历史真实。全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而由于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很大，在正式政区以外又有准政区的形式存在，加之政区层级、幅员及边界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程度不一，因此各卷又独立成书，其考证过程和编写结构有各自的侧重点。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各卷作者在相关领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全书的写作也倾注了十余年之功，希望能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作者简介



周振鹤，1941年生，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治历史地理学，兼治中外文化交涉史。创立政区地理概念，并开创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创新文化地理研究，始创历史语言地理与宗教地理研究，并倡立文化语言学概念，提倡语言接触研究方向。曾先后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东洋文库，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任教、任职。主要论著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十余种，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多次获全国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



李晓杰，1965年生，河北唐山人。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工作，任助理馆员。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2年度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3年至2004年度任大阪大学文学部COE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政治地理、《水经注》、中国古代史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东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疆域与政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合撰）、《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总论 提要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三卷分别对各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过程进行断代的具体考证，一般较少涉及理论与规律性的论述，而由卷前的《总论》来承担通代的政区变迁规律的研究，作出系统的理论性分析。

总论主要内容：一是论述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对象与意义，并对行政区划变迁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二是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分析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特点以及影响其变迁的因素；三是综述历代特殊形式的行政区划类型；最后以对于中国政治地理的两种基本格局的分析作总结。

先秦卷 提要

本卷依据传世与出土的有关文献，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期行政区划的产生及其变迁，同时，兼而论及了与政区紧密相关的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疆域的演变过程。

全卷共计十一章，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角度，并参照已有的相关研究，对商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作系统的审视。

第二部分（第二、三章）主要探讨春秋时期县与郡的各自情况。首先，详细论述县与郡分别产生的经过；其次，对楚、晋两国各自所设置的数十个县，依年代顺序，逐一进行考证；再次，对有文献记载的周、秦、齐、吴、鲁、卫、郑等国所设之县亦作了梳理。

第三部分（第四至第九章）详尽考察和论证战国时期各国所设置的县与郡（都）。在对从春秋到战国时期郡县制度的变化以及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概况作总体的描述之后，将各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所设的二百余县及数十郡（都）的始置之年、县的地望、郡（都）的领域及其在不同年代的各自归属，又依次作了动态的具体考订。

第四部分（第十至第十一章）对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疆域的变迁作逐年的考证。由于政区与疆域之间的关系密切，理清其时诸侯国的疆域变动轨迹，对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政区的沿革是大有裨益的。本部分的研究，使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各自疆域范围有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界定。

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本卷还附有系列性图表，将主要的考证结论有层次地、直观地作了展现。

谨以此书献给恩师谭季龙(其骧)先生

前 言

行政区划与人的生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有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如同我们对空气没有感觉一样。极致地说,我们从出生起直到告别世间,都必定活动于某一行政区划中,但却很少有人对其有真切的了解。行政区划是怎么产生的,数千年来经过什么变化,将来又会如何,似乎不是太多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最需要并且最合适的治理方式,就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下进行的分地域与分层级的行政管理。这种分地域与分层级的管理体系就是行政区域,或曰行政区划。《左传》引春秋时郑国执政者子产的话说,为政“如农之有畔”。畔即是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政治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界限。任何政治权力都有其界限,这一点是当政者最需要注意的。在农业社会里尤其如此。农民的田地有界限,政府治理的区域有界限,国家也有界限,超出界限就不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了。由田地界限发展提升而来的行政区划界限,可说明行政区划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进一步而言,行政区划直到今天还在规范制约国家与地方的政治活动与经济生活,如何进行合适的行政区划制度改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但重要而且异常迫切的课题。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行政区划体系的历史变迁全过程,尚未有一部学术著作予以深入的专门研究。我们撰写这套十二卷本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即尝试来担起这一重任。

本书研究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过程。过去与本书研究对象大体一致而内容属于纲要性质的著作,或称疆域沿革史,或称沿革地理。这些专著对行政区划变迁的研究只以朝代标尺,也就是说,对每个朝代只复原其代表性的行政区划面貌,至于朝代内部的政区变迁则不涉及,而且即使对代表这个朝代的行政区划面貌也还考证不够精细,内容比较简单。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研究还不够深入,而且在客观上,朝代内部的政区变迁也因为史料的严重缺乏而难以把握。还有一类称作地方行政制度史的著作,则把行政区划变迁与地方行政组织合在一起研究,但多以研究地方官制与地方建

制为主,对行政区划的具体变迁关注不多。行政区划的研究是一种空间的、立体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必须能够体现在地理方面,能够画出地图来,如果不能体现在地理上,或与实际地理情况扞格不通,则研究归于失败。这种要求显然难度较高,这恐怕也是地方制度史著作详于行政组织而略于政区变迁的主要原因。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不单纯是历史学科之事,而实际上是处在历史与地理的交叉范围中,或者说,从历时的线索看来,具有历史学的性质,而从共时的平面看来,则具地理学的性质,可以看作是某一时段甚至某一年代的行政区划地理,也可以称为行政地理或政区地理。这种纵看是历史、横看为地理的研究,显然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它不但要求研究者要对史料进行穷尽式的搜集、排比、整理,还要求他们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恰当运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缺环,以复原变迁过程的原貌。这种原貌因为要体现在地理方面,就不便留下空白的区域。此外,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所以这一研究又与政治学有所关联,尤其在理解变迁原因时,政治学的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少要横断这样三门学科的行政区划史研究,历来相对冷寂:除了历史地理学者以外,涉足的人较少,即使在历史地理学科中,专门研究行政区划变迁的,也为数不多。虽然从清代乾嘉学派以来,有不少人从事个别的政区变迁问题的研究,但考证功夫做得最出色的也只有钱大昕与王国维两人,有些人或自以为对政区地理有研究,其他行外的人也对之这么看,其实并不见得真正懂得政区地理变迁。当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大有改观,但历史政区地理始终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分支,这一点在本套通史《总论》的相关章节中将详述。

由于历史撰写的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总是有选择的,例如在中国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而很少述及一般的社会事件。而且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相比,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偏颇的记载,经过长时期的消磨,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更少了。尤其因为历史学家著史的观点不一,所要保留的不是所有历史事实而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如司马迁一部《史记》彪炳千秋,但他并不只是记载史实,而是要通过历史的编纂来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所以他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如他虽为秦始皇立本纪,但对于秦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划分全国的行政区划,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至于这三十六郡是哪些,如何分布,则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除了史料残缺的遗憾外,还有记载矛盾的现象,这

种矛盾现象有时使历史学家们手足无措,或者急于弥缝调和这一矛盾,而作出随意解释,或者简单地判定某一记载为误,进而草率修改原始文献,以符合自己的解释。这种矛盾的记载,以《汉书》中有关象郡沿革的两段文字最为典型。该书的《昭帝本纪》记载: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而《地理志》却说:“日南郡,故秦象郡。”若依前者,则象郡直到西汉中期还存在,其地在今广西、贵州一带,而依后者,则只有秦代才存在象郡,而且其南境直到今越南中部。两条记载大相径庭,哪一条靠得住呢?

由此看来,依靠有限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有时被歪曲改造过的史料来重建历史、复原历史真实面貌,尤其是对行政区划变迁这样不被详细记载的情况而言,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过也正因为难度大,才更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先师谭其骧先生以及从清代乾嘉以来的诸位从事沿革地理研究的前贤,就曾投入很大精力进行行政区的复原工作。其中考证成功的愉悦与甘苦,只有从事同样研究的学者才会深刻体会到。胡适曾经说过,解读一个字与发现一颗星在学术上的意义是相同的。此话或许有些过分,但不无道理。考证成功对研究者而言,好似解算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说明思路的正确。但有时这种愉悦只能与少数同好共享,特别是在今日,面对不但视考证为畏途,甚或采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时,这种情感就更不足为外人道了。

复原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史料的不足。现成的文献对于复原一个朝代的经制,即代表性制度,虽然有难度,但到底还比较容易入手,而对于复原各朝代内部的变迁过程,就远远不足,缺佚过甚。因此本书在一些地方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以弥补这一缺陷。这种推理其实是考据的一种方式,即排除其他可能性而留下唯一的一种可能。在政区变迁史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是分析归纳的方法。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汉代定襄郡的始置年代,在《史记》、《汉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班固仅说其为“高帝置”,但王国维的《汉郡考》不以为然,断定高帝时不可能置定襄郡。但如果我们细读《汉书·高帝纪》,会发现有一条记载说高帝十一年(前196)以“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此处云中指的是云中县,为云中郡的郡治。这条记载说明该年汉高帝对云中郡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将云中郡缩小为原来云中郡的西半部而已。那么云中郡的东半部又如何呢?《高帝纪》没有明说,但对照同书《地理志》,我们知道云中郡东部的县恰为定襄郡所辖。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定,在缩小云中郡的同时,以该郡东部地设置了定襄郡。虽然《汉书》对此未曾载明,但这个结论似可视为定论。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政区变迁年代的确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会复原出不同的政区面貌来,这就如树木的不同段的切面是不一样的。当然,由于史料的局限,并不能期望所有朝代的政区变迁过程都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复原。大致说来,在隋代以前,应把高层政区与统县政区的幅员与界址弄清楚;在唐代以后,要进一步将统县政区所属县级政区的置废并省也弄明白;至于大部分县级政区本身的幅员与界址的变迁,则非目前的史料资源与研究水平所能解决。对于变迁过程研究的详密程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以年度为标尺,亦即对每年的变化都希望能复原出来,但对于史料特别缺乏的朝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只能粗疏到五年、十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段了。

要而言之,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首要在技术层面,亦即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换言之,不作过多的价值评判,而重在复原历史面貌,但本书的《总论》在总结二千余年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时,将提出主编个人对政区变迁原因与规律的基本思路,在具体复原各个历史时期政区变迁面貌时,虽然也牵涉到诸多制度问题,也要指出变迁的原因,但大都不作鉴往知来的哲学思考,也不全面接触规律性的判断。这或者可以看作一种折中的思路,既不是史科学派,也不是史观学派,希望能对历史哲学家与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实践者有参考作用。这样的书正如前人所说是“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讽诵,质而无文,人所厌观”,只可能有专门的读者,而不会成为流行读物。本书作者同人虽关心未来政治改革走向,但不作盲目的推测而只是作可能的建议。而在这当中,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对历史学研究本身能起基础性的建设作用。在国外的研究者中,已注意到行政地理因素对于历史事件所起的作用,因此《剑桥中国秦汉史》在西汉部分画了不少历史地图,以说明如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这样的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经过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之后,汉初诸侯王国的封域已经被强制划小,因此吴楚之乱号称七国,其实这七国疆域的总和只不过汉初两三国的范围而已,反叛力量并不大。然而由于地理考证是一项专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此很遗憾的是,除了一幅以外,这些地图都画得不正确,也就是说没有复原当时行政地理的真实面貌,于是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的理解也就不够真实可靠,从而影响其说明分析原因的力度。

本书本应该由先师谭其骧先生主编,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无论在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与权威的成就,在疆域政区变迁史方面,他的成就尤其独特。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擅长利用人所常见的材料得出人所不见的事实来,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

目前政区变迁史体现在地图方面的最高成就。如果天假以年,他本来会先写出一部以朝代标尺的行政区划变迁史的。事实上,十几年前他为《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写的图说,已具备最简练的中国疆域行政区划简史的意味。而且先师在世时已开始指导断代政区地理,即朝代内部政区变迁的研究,如果各个断代的研究完成,就是行政区划通史的成功。可惜先师于1992年遽归道山,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我在先师指导下作了西汉政区地理研究,自己也指导学生作过同类的研究,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与艰难。以重要性而言,先贤已经指出,地理是历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这里的地理指的主要就是疆域政区,而这把地理钥匙并不好掌握。马王堆汉墓出土以后,不少学者撰文讨论西汉长沙国的范围,但都以《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十三县为说,却不知该汉墓营造时的长沙国比《地理志》所载大了一倍有余。而要考证得出此结论,正是艰难之所在。

近二三十年以来,学术界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专门史方面,不少冷僻课题或琐细的方向都有人从事研究,但于行政区划变迁史方面仍然相当寂寞。这一课题在过去就已被归入繁琐考证的领域,因为如果没有坐冷板凳的功夫,是难于出成果的,即使有了这个功夫,没有基本的素养也还是不能成功。谭其骧师曾经说过,历史地理学界许多人看不上沿革考证,而恰恰这些人始终没有过好这一关。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都不能脱离考证工作,而沿革地理的考证又是其中之难点,常常是投入甚多而产出颇少,因此除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以外,没有其他动力可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项既需要锲而不舍而又不能立竿见影的工作。更何况这项研究历来还被人认作没有实用价值,一两千年以前的政区面貌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尽管近年来各项学术研究成果累累,而政区史研究仍然空白的原由。

本书在总论外,分为十三卷,按年代先后及作者各自的擅长,分叙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过程,诸卷依次是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朝、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十国、宋西夏、辽金、元代、明代、清代、中华民国时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上海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金的支持下,我与国内擅长于政区地理研究的学者在数年间共同讨论,互相切磋,分别撰写出各卷内容来,同时又力求框架的基本一致以及风格的大致统一。但由于政区概念随时代而发生变化,政区形态差异很大,各历史时期的政区变迁特点不同,因此各卷研究内容各有侧重,要求写作风格及个别观点完全一致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又由于各卷难度有异,文献有详有略,

前期研究成果多寡不一,因此各个时期政区变迁全貌的复原的细密程度也有差别,如郡一级政区,在汉代可以做到以年为尺度,但在三国时代却只能切分几个剖面,而无法以年度甚至十年度为断限。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未能将各卷同时推出,而是以分批出版的方式行世,正所谓学术研究的并非追求轰动效应。

最后,还得申明一点,本书的研究成果不能视为最终结论。学术研究无止境,没有所谓铁板钉钉的定论,不但是新的观点要代替老的结论,而且新材料的出现也许又会使原有的考证被推翻。例如秦一代郡目经过数百年学者的考证已经基本定讫,《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据以成图,但两年前出土的湖南里耶秦简中却有洞庭、苍梧两郡为传世文献所无,颠覆了历来的定论,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证整个秦郡之体系。所以本书的结论是中间性的,希望有人能证伪,能推翻,能有更新的认识。这就是本书作者同人最热切的期望。

周振鹤

2008年9月于复旦大学

附识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自2007年开始陆续出版以来,至今年年底,首尾已经历时十年。一部主要以沿革考证为主、可读性甚低的学术著作能得到众多读者以及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诸位作者都觉得极为欣慰。读者的支持不但表现在已出各卷的销路十分理想,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这些卷帙提出的修订意见。一部作品行世以后,作者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当这些赏识是以修订建议的形式出现时,尤其令作者们有“吾道不孤”的感觉。是以趁着再版的机会,已出各卷根据作者、编辑们自己的笔误、编误,以及认识的提高深化,加以或多或少的修订,有的则加上原本已做好,但当时因受制于篇幅而未纳入的内容,譬如《明代卷》的沿革表,使全书面貌更加完善充实。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能与现今的行政区划相对照,此次修订将古代政区的今地都统一修改为以2014年底的行政区划为准。上述的改进与提高,在读者的审读下,一定还会有不少待改进之处,希望将来再有机会修订提高。

2016年底于复旦光华西主楼

总 目

前言·····	1
总论·····	1
先秦卷·····	217

目 录

第一章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对象.....	7
第一节 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与相关概念.....	7
一、行政区划的定义.....	7
二、行政区划诸要素.....	9
三、广义的行政区划.....	11
第二节 行政区划史的学科背景.....	13
一、相关学科.....	13
二、交叉学科(政治地理、行政地理与政区地理、沿革地理).....	14
第三节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5
一、研究对象.....	15
二、相关概念.....	16
第二章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意义.....	22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的需要.....	22
一、行政区划是解释历史事件的基础.....	23
二、行政区划反映政治过程.....	24
三、行政区划反映经济发展的态势.....	25
第二节 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	26
一、专门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26
二、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的基础.....	27
第三节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31
一、行政区划的可变性与承继性特征.....	31
二、今天我们如何改革行政区划体系.....	32
第三章 行政区划变迁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35
第一节 行政区划研究史的三个阶段.....	35